

第一章 大東亞戰爭和香港的新生

第一節 香港脫離英國後的地位

昭和十六年（1941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站立於全新的起點上。在其光輝的歷史瞬間中，我大皇軍佔領香港，將英國在香港留下的所有痕跡全部清除，並添加上大東亞的印記。香港從英國式轉變為大東亞式面貌的現實，述說了其新生的真正意義，同時也必然標示了貫徹這一理念的根本方向。

昭和十七年（1942年）二月二十日，香港佔領地總督部的成立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無可辯駁地闡明了上述香港新生的意義，也確立了此後需遵從的理念。或許據此也能夠看出新生香港的各行各業受到了嚴格的整頓。

為何只在香港設置佔領地總督呢？在不斷推進大東亞聖戰的同時，我無敵皇軍佔領了大片地區，但唯獨在香港設立佔領地總督部，其中必然存在著某種特殊的理由。

佔領地總督部與直屬於內閣的總督府有著本質的不同，其是依據軍令進行軍政的機構，因此其執行的軍政大綱是依據軍隊命令來明確制定的，有關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制定軍政大綱的目的，其具體的內容要素都蘊含著佔領地所具有的特殊性。而且很多情況下，這種特殊性一方面形成了該佔領地軍政的特色，另一方面深入考察就能發現，正因為這種特殊性的存在，才能在此基礎上計劃和實施具體的軍政。

所謂香港的特殊性是什麼？這是下一步需要著重探究的議題，如果沒有明晰這一議題，就不可能真正認識到香港的重要性。



在論述香港特殊性和重要性的論斷中，存在截然相反的兩種傾向。一種認為香港的重要和繁榮是基於英國政治經濟的影響而得以出現和維持的，因此在英國沒落的今天，香港的價值將會隨之減半。當然，如果探尋香港的歷史發展過程，便可知曉香港的繁榮多是由於英國在過去長達百年的時間裡堅持不懈努力建設發展而來的。英國將香港作為侵略東亞的根據地，動用一切可能手段搶奪香港殖民地和新界租借地，同時積極建設各類設施，使其成為英國在東亞的經濟中心，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驚訝英國的功績之餘，我們不能忽視中國在其影響下產生的重大變革。中國國民革命運動蓬勃發展，正是以中國南部為支點，不斷向全大陸傳播近代化風氣進行的。可以說，英國是以香港為據點，趁著中國這頭衰老的獅子昏睡之際，肆意滿足其貪欲，但與此同時也從中國南部的一個角落喚醒了這頭獅子並使其容光煥發，最終猛然露出獠牙重新振作起來。於是在英國看來，香港百年繁華建設的後期，就是一部中國接連不斷的反英運動和革命鬥爭的流血犧牲史。在香港建設後期近50年的歷史中，英國方面由於大東亞戰爭的持續推進，其命脈被完全切斷，但香港所具有的政治經濟等重要性並未完全隨之抹殺。特別是通過對比戰前繁榮的自由經濟和當下的經濟狀態的香港價值的評論，幾乎都是不了解發動大東亞戰爭本質的議論。可想而知的是，香港經濟的現狀不僅是從英國佔領狀態向大東亞狀態轉變的過渡性階段，而且是在有史以來最嚴峻的戰局形勢下難以輕易達成的轉變。

針對上述觀點存在一種主流性學說，即在香港歷史上積蓄的東亞價值中謀求其論據，從而在這種認知中出發，為大東亞的建設而絞盡腦汁，充分發揮香港的作用。

於是，筆者思考僅依據後者的觀點，即能夠準確把握大東亞戰爭開戰後香港的特點，從而據此詳細理解在香港設置佔領地總督部的目的，以及佔領香港的真正目的。因此，筆者嘗試通過以下幾節稍加詳細地闡述該論點。

第二節 不斷強化的政治重要性

持香港利用論者，斷言香港具有巨大價值的理由，不僅局限於依靠大東亞戰爭徹底清除了英國的佔領勢力，且香港的政治重要性日益增強，經濟地位也依舊保持不變。

首先，我們討論一下香港的政治重要性在大東亞戰爭開戰後是如何變化的。這個問題一方面要從解決對華問題（培育南京國民政府和打倒重慶政權）的方面來探討，另一方面還必須從與分佈在大東亞各地的所謂南洋華僑的關聯上來討論。

因此，要從解決對華問題方面來探討香港的政治重要性，必須認識到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歷史必然性。中國在過去半個世紀進行的國民革命運動，其前半期主要是將矛頭指向清朝末期的政治弊端，而後半期主要是困擾於國民政府成立後的陣痛，但期間對外部則進行了抵禦以英國為首等外國勢力的不斷鬥爭。當然，在晚清窮途末路之時的中國，推進近代化的因素主要是由於與外國的接觸、列強的侵略以及對列強侵略的抗爭。清朝的窮途末路、近代化的蓬勃發展、革命運動的持續蔓延，這一系列由舊體制轉向新體制的國內變革過程，都伴隨著對外談判和對外抗爭。在中國百年近代史，英國擔當著重要角色。清朝末期，最早在閉關鎖國的中國叩開廣東門戶的是英國。通過鴉片戰爭無理、強硬地打破中國門戶，進行殘忍侵略的也是英國。與此同時，以中國南部為中心，遭受來自中國



最強烈反抗的可以說也是英國。但是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國內的日漸頹敗，加之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的強力反抗，導致其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轉變，從一直以來的外交上對華強硬政策轉變成曖昧態度。伴隨著這種轉變，英國還採取各種手段意欲將中國排外運動的主要目標從自身轉向別的國家。後來，其將目標轉至日本的結果，即是爆發了中日事變，進而擴大為整個大東亞戰爭。這些事實也不必多言。

在上述的經過中，我們不可忽略兩個關鍵要素。其一是中國的近代化和國民革命運動都是發源於中國南部，其領導層均由中國的南方人組成。其二則是在此運動中有著最大關聯的即是英國的根據地——香港。於是我們必須進一步考察上述的歷史性因素將如何在現階段發揮作用。換言之，在其中能夠發現其國內矛盾，即在南方人的領導下持續發展的國民革命運動依然會繼續，另外香港則去除其英國性質，轉變成東亞式地區。在對比研究香港的歷史發展過程和現階段的新生進程時，我們究竟會從中領悟到什麼呢？

總而言之，日本在歷史方面的對華研究，大多是以北方為重點來展開的，而對中國南方的研究少之又少。所謂對華研究，感覺可等同於對中國北部的研究。在觀察國民革命爆發之前的中國時，上述的研究方式大概即能夠滿足需要了。但是近代中國受到由南方人領導的國民革命洗禮，我們若要充分理解如此一個近代中國，僅僅研究中國北方是難以觀其全貌的。甚至可以坦率地說，不正確認識南方就難以準確把握近代中國。因此筆者堅信這樣一種認識是符合我國對華政策的。現在的國民政府自不待言，其領導層的大部分人都來自南方，另外由於中日事變而產生的重慶政權的領導人也大都出自南方。因此可以說解決對華問題，必須從認識和把握南方

來入手。經濟層面的觀點我們暫且擱置，僅從政治層面的重要性來看，我們必須認識到南方在我國解決對華問題策略上的地位十分關鍵。如此來看，香港作為南洋的重要據點，其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次，彰顯香港政治重要性的第二點是其與南洋華僑的聯繫。俗話說「南洋華僑八百萬」，如果加上由於各種原因加入居住國國籍的數百萬華人，在南洋各國活躍的中華民族及其子孫則不計其數。而且，在包括泰國、菲律賓、緬甸、印度支那、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島、加里曼丹島、沙撈越、汶萊等南洋全域活動的海外中國人，在大東亞戰爭爆發前都壟斷著各地的經濟霸權，甚至還發展到獲得並掌控著部分地區的實際政治權利。他們對國內的近代化進程，在經濟政治等方面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這一事實比我們想象的還要關鍵。所謂華僑的捐款以及其他經濟方面，將在下節考察香港經濟重要性時詳細探討，而關於政治方面的貢獻，他們創造了滋生國民革命運動的溫床，並在驅逐列強運動中充分發揮了先鋒的作用。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資金大部分都是依靠華僑的捐贈，革命先驅們臥薪嘗膽、伺機而動，也是由他們提供了棲息之所。如果沒有這些華僑，中國國民革命不會有今日的蓬勃發展，這是毋庸置疑的。同時，伴隨著革命政府的不斷壯大，遵從其驅逐列強運動的命令，站在反英救國以及後來抗日運動最前線的即是南洋各地的華僑。他們為什麼願發揮如此重要的作用，其原因就是革命者與華僑是血脈相通、有著同一故鄉的南方人。原本華僑們就因難以忍受清朝末期的政治凋敝，且生活難以為繼，才抱著為家鄉做出些許貢獻的念頭，南下尋求新的天地。可以說，他們響應革命領導者的號召，毅然決然振奮起來，心潮澎湃地發揚革命精神和支持國民革命



是最理所當然不過的。

然而，以中日事變的發展為契機，國民革命運動重新活躍起來，換言之在成立當前南京國民政府和重慶政權逐漸沒落的事實面前，上述華僑和國內的關係出現了嚴重動搖。從我方看來，華僑陣營分裂為親日方和親敵方兩大派。特別是大東亞戰爭爆發後，這些親敵派現在不遺餘力地全面倒向支持現南京國民政府。但是時至今日不得不說，在政治上持觀望態度的南洋華僑所佔比重還是很大。

順便一提，這些華僑還有一個幻想，這是出國時就深深埋藏在心中的希望，也是在南洋遙望思念故鄉之時所憧憬的理想。即是在生意成功後能夠在自己的村子裡建造一處大院子和一塊墓地，並且在香港設一處豪華別墅。現在已有很多成功者實現了這一願望。中國人十分看重血脈、家族以及作為其基石的故鄉。在這一點上，全世界範圍內都無出其右。華僑們即是這種思想的最佳代表群體，而且像前面所說的，在政治上他們與國民革命、驅逐列強運動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後面會提到在經濟上也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通過他們的族中首領或者他們的後代，與香港保持著密切聯繫。這也充分表明在我對華僑政策上，香港具有難以替代的重要性的現實。

再次，認為香港具有政治重要性的另一個關鍵因素，是在其人口構成上，即中國人戶口佔有著壓倒性多數的現象。全香港 80 萬人口中，華人佔其中的九成以上，其人口成分絕不是那麼簡單的。當然，大部分華人是從中國大陸南方遷徙而來的農民，他們的子孫在香港定居下來，但他們依然與家鄉有著難以割捨的羈絆。還有一部分上海人和北京人也有著相同的思維。其中還包含南方華僑的家人或者華僑中的一部分成功人士。雖然構成如此複雜，但這一

人群依舊被統稱為華人。這些人幾乎構成了香港民政的全部組成部分。香港內政的每個舉動，都通過貫通南北的中國大陸，甚至牽動著南亞國家各個角落的中國民眾，我們絕對不可忽略其中的關聯性。因此，我們認為在對香港實施軍政中，統治華民，即民政策略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即是認識到了這一點。

總之，既然大東亞聖戰的第一目的是要確保東亞地區的安定團結，那麼在驅逐英美列強侵略勢力的同時，還必須實現正確解決對華問題。從這個角度來看香港佔領地的地位時，就能發現其僅在政治方面，就具有如前所述的地利人和的特性，重要性是不可比擬的。同時，在將香港從英國式轉變為東亞式地區的過程中，只有在上述問題中尋求契機才具有真正意義，也才能理解香港現在的新生階段與過去相比，其重要性大大增加的原因。

第三節 經濟重要性依然強勢

新生香港在東亞區域，其經濟重要性並沒有減弱，相反，其重要性在戰爭開始後愈發增強。為了闡明這一點，我將嘗試從香港經濟的靜態特徵和動態特徵兩個方面加以分析。

所謂靜態特徵，即根據香港所具有的經濟地理條件、經濟設施機構、資本、勞動力、資源以及存貨，甚至潛在生產力等綜合性價值考量而推導出的特點，但僅這些方面並不能在香港的經濟重要性中產生巨大的本質變化。香港扼守珠江口，是南洋一帶的關鍵地區，而且作為大東亞南北廣闊地域的中心，其要衝地位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香港依舊是世界之上數一數二的優良港灣，整齊排列的巨大倉庫群、大大小小的眾多船埠和碼頭、登陸等港口所需的各類設施以及所有相應功能都被保存了下來。為了使得香港更具特色，成



為東南亞第一港口，當局正在戰前的設施基礎之上興建增設各類大中型近代船塢和造船廠。與此同時，還積極對其附屬的其他機器製造工廠等功能設施進行擴建或合理化整合完備。可以說不僅是那七八百家華人經營的小規模工廠，就連敵對方經營的近代式大工廠也都未遭受戰爭摧毀。馬路、上下水管道也沒有受到任何影響。陸上交通設施方面，鐵路、山路、市區公交電車、汽車等在佔領完成後也全部得到了恢復，甚至還於近期將鐵路一直通到了廣東，完全恢復了陸上交通的各項功能。海上交通方面，不僅是佔領地範圍內，就連與廣東、澳門等其他周邊地區的聯繫，以及與遠隔重洋的多個國家的定期航路也都建立起來。航空運輸方面的功能也逐漸完備。在其他方面，觀察商業機構的狀況，百貨商店、小賣店等終端配給機構與舊體制時相比沒有任何衰退，日本商人結成的進出口貿易公司等主要貿易組織也日趨完備。敵對銀行的清算體系暫且不提，在金融貨幣機構方面，日資、華資各家銀行都已開張，用以替換港幣的軍票正在以堅實步伐逐步流通起來。更為重要的是，豐富廉價的勞動力基本上未受到戰爭疏散工作的影響。從靜態方面來看，現有資本由於港幣貶值和人口避難等原因出現很大程度的縮減。從這一點來看，由於過去兩年時間的消費等原因，現階段確實存在存貨量呈現一定的減少趨勢，這個現象不可否認。但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香港作為戰前大東亞地區中轉港口的重要地位，如今依然被保留下來，甚至有所加強了。

但問題在於，英國在東亞全域所形成的經濟機構網現在已被徹底清除，香港所具有的這些靜態經濟特徵，究竟能否一如既往地繼續發揮作用是個問題。無論有多麼優良的硬件設施，如果沒有繼續利用的價值，也只能是畫餅充饑。因此接下來我們必須對上述條

件進行動態研究，以準確把握其功能的重要性。

在動態研究香港經濟重要性時，我們需要從香港自身的經濟繁榮問題和香港為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發展的貢獻能力兩個方面來探討。這兩個問題是互為表裡、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在某種意義上相互間還存有一定的因果關係，但假使有人以香港內部經濟繁榮程度，來推斷香港為大東亞經濟的貢獻能力的話，我認為是十分危險的。

說實話，若要達到檢驗香港經濟重要性的目的，香港的自身繁榮不過是第二層面的因素。甚至可以說，即使香港的燈光熄滅、街道摧毀，只要對大東亞戰爭的完勝和經濟建設的貢獻沒有受到影響，我們依然必須承認香港的經濟重要性。因此，若對比戰前英國式街道的繁華和香港目前狀況以述說其經濟的衰敗，並由此延伸去評論香港前途的話，那不得不說是本末倒置了。如果用以往自由的生活條件和豐富的生活資料來定義英國式的香港繁榮特性，並以此為標準來批判今天東亞式的香港，更是忽略了有史以來最為嚴苛的戰時經濟形勢，而進行的肆意妄論了。

因此，所謂香港經濟的重要性，應主要從其對大東亞經濟運營的貢獻能力方面進行觀察，但其中容易產生誤解的是香港所擁有的現有商品庫存問題。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很多研究香港經濟地位的人士，其研究依據僅僅局限於其豐富的商品庫存時至今日已然消耗了兩年，或是想象現有商品庫存的匱乏，便認為香港的利用價值已經微乎其微了。當然，香港所持有的商品庫存，從開戰前幾年起，就成為英國悄悄積蓄軍需物資的主要來源，可以想見其數量是十分可觀的。因此不難想象，佔領香港後這些庫存將成為實施大東亞戰爭的重要支撐。雖說如此，但現在庫存並未減少到嚴重匱乏的



狀態。當然，如果只考慮一味消費而不進行補充，則也大體能夠想象物資匱乏的窘況；然而另一方面，香港本身生產的部分物資被運送出去用於支援大東亞戰爭，此外，並非全部商品庫存都是直接的軍需物資，因此通過這一點推測可知香港的物資庫存還十分可觀。雖說如此，庫存終究是庫存，一旦消耗殆盡也就徹底消失了。所謂生產性的物資消耗自然是為了以此來進行新物資的再生產，但即使如此，這一關係也難以永久持續。總之，不得不承認現有的庫存僅能滿足當前一個時期內的需求。因此，如果僅僅拘泥這一點來判斷香港經濟能力的話，就像坐吃山空的乞食者的廚房，很容易得出在不遠的將來就會出現衰竭的結論，且無論是誰去研究都將會得出這一當然之結論。然而，這一結論忽視了香港其他經濟要素的存在和其利用價值，或許可以說陷入了嚴重的誤區。

那麼應如何看待香港經濟的作用呢？答案不需要具體詳細的說明。僅僅從上述的靜態特徵究竟會對現在的大東亞戰爭和大東亞建設有多大利用價值，進而想象其可利用程度有多大，自然而然就能得出答案。同時可以說由此也能推測到，在共榮圈建設持續進行和最終完成的前提下，未來香港經濟將發揮重要作用。此外，我們還可以想象在完全不利用香港的經濟實力的情況下，此時大東亞的戰爭經濟和建設經濟運營會是個什麼狀態。因此從消極的角度來講，依然可以看到香港經濟的利用價值。何況，當看到平日裡無數大小船隻駛入駛出、船塢滿負荷運轉、各類大小工廠正常運營、礦山持續開採等等繁華景象，我們必須更積極地承認香港經濟還是能夠發揮巨大作用的。這些可利用的資源全都在為大東亞戰爭勝利和大東亞建設的持續運轉，這些事實已不用過多贅述。因此通過動態方式觀察香港經濟的重要性，也可見一斑。

再有，當我們想到香港對於未來的重要作用時，首先應當考慮的自然是香港具有近代先進的設施設備，而關於如何充分發揮其港灣能力和利用價值的問題，已然沒有必要再重複敘述了。進一步說來，我們絕對不能忽略的是香港保有的輕工業工廠以及與東南亞華僑的密切關聯。由於原料或供給的原因，在當前的香港還有很多中小規模的輕工業工廠處於休整狀態。當我們遙看缺少設施設備而具備巨大需求的香港以南區域，並慮及中國南方大陸時，就會異常期待這些要素發揮巨大作用。

而且，依據上一節所述狀況，在經濟方面華僑們對中國有著重大貢獻，所謂華僑捐款在維持中國國際收支上也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作用。與此同時，其在南洋地區和中國的貿易關係上也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們控制著南洋各國的各類產業和金融業，同時還控制著貿易的支配權，其聯絡處大都設置在中國南部和香港。他們在香港設置的南北行、九八行和客頭就是最明顯的例子。¹ 同時我們也不能忘記一個事實，即香港是華僑捐獻錢款的最大中心地。如果再考慮到這些捐獻錢款經過並集中在香港的必然性，我們就會在



~~~~~  
1 編者按：文中所述的南北行和九八行，具同源的關係。顧名思義，南北行指經營南北兩線的貨品，南線以經營東南亞各地土產和食品為主；北線以經營中國出口貨為主，南北貿易貫通以後，漸次發展遍及全世界，整個行業仍總稱南北行。早期南北行經營的業務除了出入口貿易外，還包括銀行匯兌、保險船務等，所以出現一些代客兌貨的行號，以九八抽佣，所以從事以匯兌的南北行又稱為九八行。由於南北行的商號大多集中於上環文咸東西街，也分佈於永樂西街和高陞街，連帶匯兌的經營也集中在這些地方。至於「客頭」，初指一種專做移民生意的商人，也稱「帶客」。由於潮州人對東南亞地區比較熟悉，出洋謀生多由客頭組織偷渡，已經移民海外並站穩腳跟的海外潮人，又紛紛委託客頭引帶自己的眷屬和親友前往東南亞謀生。因此，客頭也代辦了潮州籍華僑與家鄉的函件和匯款，幾者成為混為一談的商業活動。

未來一個階段倍加期待香港的作用。

#### 第四節 現階段及未來的香港利用價值

我們通過上述內容，對香港的政治、經濟重要性進行了簡要說明，隨後引發的問題是，有人批判現階段我們有沒有最大限度地利用香港的政治經濟價值。

當然，現在並不是利用香港價值最理想的狀態，這也受到了當下戰局的制約和多重困擾，但絕不能將此看作限定乃至否定香港價值的依據。事實上，即便是到了認同香港價值的程度，也會有人以「現階段沒有對其更好的利用方式」對香港的利用價值進行限定或否定。而一旦認識到其真實價值，就必須更進一步地努力充實利用香港的各種手段。換言之，香港未在理想狀態下被加以利用，或許正是國內外對香港的認識並不充分的佐證。本書將通過以下幾部分更為詳細地介紹香港的現狀。

當根據前述現實情況思索香港未來的利用方式時，香港「大東亞核心」的地位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被忽視的。如果我們探討研究香港未來政治的重要性和經濟的利用價值，其作為大東亞核心自然會為整個大東亞而不斷發展。而且為實現其利用價值的不懈努力，正符合大東亞聖戰的目的，也是貫徹佔領香港的真正意義。

香港不斷為大東亞戰爭的勝利做出貢獻，同時積聚著極為微小的力量，在困難重重的條件下不斷建造而成的香港神社、忠靈塔、佛舍利塔三大建築，絕不是簡單裝飾，也不是與當前慘烈戰局毫無關聯的閒雜事業。如上所述，香港作為大東亞政治經濟的核心，在精神上宣揚香港今後發展理念的，正是這些神社、忠靈塔、佛塔。因此，香港這三個令人敬仰的精神支柱，將永久地引導佔領



地居民的行為方式，同時比起遙遠的海外，對於仰望此精神支柱的全東亞各民族，都能從這裡感到無限正大的光明。

## 第二章 歷史

### 第一節 英屬以前

#### 一、關於「香港」地名的由來

香港一詞用標準中文發音是“Hsiang Kang”、粵語的發音是“Heung Kong”、客家話的發音是“Hiong Kong”。英語中寫作“Hong Kong”、日語也仿此將其寫作「香港」、讀作“hon kon”。這與北京、西藏等地名一樣，都是英漢混淆的表現。「香港」是歷史上的新地名，但此名的由來眾說不一。在《廣東通誌》和《新安縣誌》中均沒有記載香港島這一地名，這一點從中國很少稱謂整體島嶼的習慣來看是很正常的。（康熙）《新安縣誌》（1688年編修）第二卷〈官富司〉一章的「香港村」中紀錄的香港一詞應是最早記載。這就是在現在「元香港」（香港仔，Aberdeen）東面深水灣客家人聚落的香港圍（英文名 Little Hong Kong）。而「圍」（常被省略）一詞是廣東省特有的一種城市稱謂形式。政府所建被稱為「城」，而百姓所建被稱為「圍」。另外，沒有圍牆的被稱作「塑」，相比北方村莊，這裡多是形成堅固的同姓村落形態。

在香港仔和摩星嶺之間有一座島內最大的瀑布，水流匯集成河最終流向大海。據說這河水有一種香氣，航行在此河的船員將其



稱作香江，將河口稱作香港，但這一說法也無從考證。現在此河在香港牧場內，十分污濁，難尋此說法的蹤影，但瀑布灣這一稱謂還依然存在。如果這個瀑布就是《新安縣誌》記載的新安八景中的「鼇洋甘瀑」，那香港島部分的舊名稱獨鼇山的說法可能就更為貼切。而且時至今日，還有人以「裙帶路」一名稱呼香港，但這本是對與本島北岸平行的山路及其東端附近的漁村（後者參見 1841 年國情調查）的稱呼，後來又轉為稱呼本島北部及香港全境。這一稱謂主要在香港的客家人中間使用，稱為“Kiuntailou”。葡萄牙人關於香港水域的記述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初，英國人的記述則從十七世紀末開始，香港島這一名稱是由東印度公司水域測量師 Captain J. Horsburgh 提出的，此人曾於 1806 年至 1819 年期間對中國沿岸進行過測量。1816 年阿默斯特被派往中國，其在途中的瀑布灣和香港灣（位於香港島和博寮洲之間）停泊一事，連同香港的名字一起被記載於世界史之上。

#### 二、英屬以前的香港

在晉朝設置寶安縣後，一直到明代該地區都先後在東莞、增城、東莞各縣、東莞守禦千戶所、南頭城、新安縣的治下，清代時先後劃歸東莞縣與新安縣（民國以後稱為寶安縣）管理。明代初期，在該地設置官富場（即後來的九龍城），直到 1810 年建成九龍寨（所謂九龍城，其最近的城牆建於 1856 年）。<sup>2</sup> 在出土的史前

2 編者按：這裡所述的 1810 年建築物，嚴格而言叫「九龍臺」。明代萬曆元年（1573 年）新安建縣以來，為防止倭寇的侵擾，在該縣各地設汛地防守，香港地區的佛堂門、屯門、急水門、赤灣、九龍皆有設汛防衛。及至清初對付南方寇盜及臺灣鄭氏政權，除命令沿海村落內遷五十里以外，更以大